

王恩田 編著

陶文圖錄



齊魯書社

王恩田 編著

陶文圖錄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陶文圖錄/王恩田編著. — 濟南: 齊魯書社, 2006. 6

ISBN 7-5333-1439-5

I. 陶… II. 王… III. 陶文—匯編—中國 IV. K877.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7346 號

陶 文 圖 錄

王恩田 編著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 編 250001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刷廠

開 本 787×1092/16

印 張 171.5

插 頁 12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7-5333-1439-5/K·439

定 價 996.00 圓

序 一

山東省博物館王恩田先生是我的老友，我常以有關山東歷史考古的問題向他請教，獲益良多。他不僅在山東省長期從事文物考古工作，還精研古文字學，有不少著述，為學術界所尊重。近些年來，王恩田先生傾力整理研究陶文，淹貫博通。他所編著的這部《陶文圖錄》及繼後的《陶文字典》、《陶文詁林》、《陶文通論》，不論就材料的完備，還是從研究的深入來說，都堪稱陶文這一支學科的集大成之作。

作為中國古文字學重要分支之一的陶文研究，與山東省有着特殊的密切關係。首先認識和收藏陶文的，是晚清山東濰縣的著名金石學家陳介祺。現在知道，陳氏最初獲得陶文，作了鑒定研究，是在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年），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這比最近大家紀念的殷墟甲骨、敦煌卷子等的發現要更早些。陳介祺是陶文研究的創始者，也是最重要的陶文收藏家。

陳介祺（簠齋）所藏陶文，主要是山東的出土品，而以戰國陶文為最多。一百多年發現和收集的歷史已經表明，在種類繁多的陶文中，數量最大的是戰國陶文，而在戰國陶文裏面，

又以在山東境內的齊、魯、鄒、滕等地陶文爲大多數。秦、燕陶文數居其次，其他地區陶文便祇是零星發現了。

陶文在中國各類古文字材料中，存在的時間跨度最長。甲骨文、金文盛行於商代後期，前期祇能找到個別例子。再往上追溯文字的始源，就惟可求之於陶文。史前仰韶、龍山時代多有陶器符號，或刻劃，或描繪，與文字有否關聯，學者間尚有不同意見。大多數學者傾向同意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是原始文字。這種陶文，多見於山東泰安及莒縣、諸城，是探討文字起源的重要依據。考慮到山東地區陶文源遠流長，其發現數量多，自不足爲異。

在陳介祺首創並提倡以後，山東及各地人士收集研究陶文的很多，然而出版的圖錄與論述卻很少。第一部正式刊行的陶文圖錄是一九〇四年的《鐵雲藏陶》，編者便是一九〇三年首先出版甲骨文著作《鐵雲藏龜》的劉鶚。此後祇有一九二二年日本太田孝太郎《夢庵藏陶》等寥寥幾種。內容最豐富的應推一九四三年印行的《季木藏陶》，係周進一家藏品。至於陳介祺等家所藏，一直以搨本流傳，尋常不易見到。還有若干藏家，早的如潘祖蔭，晚的如姚華（茫父），當時以多精著稱，現在連整套的搨本也難尋覓了。有學者富於卓識，編輯了陶文的文字編，如顧廷龍先生的《古陶文彙錄》，金祥恒先生的《陶文編》，所據也以一些搨本爲主。

隨着考古學、古文字學的迅速發展，陶文的整理研究近期也有很大進步。如在最近十年間，高明先生的《古陶文彙編》和高明、葛英會兩先生的《古陶文字徵》，於一九九〇、

一九九一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後來，上海書店印過徐谷甫的《古陶字匯》。一九九八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李零先生考釋的《新編全本季木藏陶》。關於陶文的研究論作，正在逐漸增多。

王恩田先生的這部《陶文圖錄》，圖版分戰國以前、齊國、鄒國（附滕、薛、魯）、燕國（附中山）、三晉與兩周（附楚）、秦國與秦代、國別待考、兩漢及其以後、參考、偽品及可疑，共爲十卷，所收一萬二千餘品，蔚爲大觀，規模之宏大，前未曾有，這給大家在新的世紀內發展陶文研究提供了理想的條件。對於王恩田先生的多年辛勤，我們都應該深深表示感謝。

陶文還有很多關鍵性的問題，迫切需要研究解決。例如戰國齊燕陶文常見的「攸」字，有過多種釋讀，從新發現的荊門包山、郭店楚簡看，恐均未妥。再如齊陶文習見的另一個字，前釋爲「鄉」、「鄙」、「遷」、「廛」等，難以論定，我猜想或許當釋爲「巷」。王恩田先生這部書的問世，必將把陶文研究推向新的階段，促進古文字學的發展。

李學勤

二〇〇〇年九月十九日

序 二

恩田先生的《陶文圖錄》即將出版，這對古文字學界是一件大好事。

從近代著名金石學家陳介祺（簠齋）在清代同治、光緒之際鑒定並開始搜集古陶文以來，一百二十多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陶文資料很零散，受重視的程度大大低於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因此在很長的一個時期裏，著錄和發表的情況很不理想，嚴重影響了古陶文研究的進展。

一九九〇年，中華書局出版了高明先生編著的《古陶文彙編》。高先生將「歷年搜集的古陶文搨片和複製的照片輯爲一書，自商至秦各種陶文計二千五百種」（見該書自序十七頁）。此書的出版，大大緩解了陶文研究者尋找資料的困難。《彙編》是在一九八七年編成的（書首中華書局編輯部出版說明以及李學勤先生和作者二序，所署年份皆爲一九八七年），到現在十幾年的時間又過去了。《彙編》對編成後新發現的資料當然無法收入，由於某些原因，對當時已出現的資料也不免有所缺漏。恩田先生的《陶文圖錄》，規模大大超過《彙編》，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上述缺陷。恩田先生留心古陶文的搜集和研究已近四十年，所搜集的陶文達二萬

餘種。他選擇其中的一萬二千餘種匯編出版，無疑會受到廣泛歡迎，對古陶文研究以至於古文字學研究的進展，一定會起到很積極的作用。

過去的古陶文著錄書，未能對所收陶文作系統的、科學的分類。《彙編》已經改變了這種狀況。高明先生除了按時代把所收陶文分爲「商代」、「西周」、「春秋戰國和秦」三部分外，還對占全部陶文絕大多數的春秋戰國和秦代陶文，按出土地區加以編排，如「山東出土陶文」、「河北出土陶文」等等。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出版的，由李零先生分類編排的《新編全本季木藏陶》，則將所收戰國陶文分爲「齊國」、「燕國」、「邾國、滕國」和「其他」四部分。恩田先生的書把早於戰國的和漢代及其以後的陶文各編爲一卷，把作爲全書主要內容的戰國和秦代陶文分爲齊國、鄒國（附滕、薛、魯）、燕國（附中山）、三晉與兩周（附楚）、秦國與秦代、國別待考、參考、僞品及可疑等共十卷；同時對有出土地點可考的陶文，則盡量注明其出土地點，可以說是兼取高、李二家之長又有了新的發展，讀者使用起來一定會感到很方便。

恩田先生研究古陶文的功力很深，繼此書之後，還同時完成了《陶文字典》，並擬完成《陶文通論》、《陶文詁林》、《陶文來源與著錄表》等陶文系列著作貢獻給學術界。我們翹首以待，希望能早日出版。

裘錫圭

二〇〇〇年八月四日

自序

陶文是指刻劃、書寫或打印在陶器上的文字。作為古文字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陶文有其自身的特點：一是時代早。在甲骨文、金文出現以前的新石器時代，陶器就已經被廣泛應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為了區別陶器的製造者、所有者和使用者，這時的陶器上就已經出現了一些刻劃符號和象形、會意字。因此，陶文對於研究文字起源有着重要的意義。二是延續時間長。其他古文字材料都有其特定的流行時期，而自古至今，凡是使用陶器的地方，都可能會有陶文存在。而陶文又往往隨書體的演變而演變，真草隸篆，一應俱全。因此，陶文可以說是一部書法篆刻藝術史。三是陶文的鼎盛時期是戰國。戰國時代是一個空前文明進步的社會大發展時期，但能够保存下來的這一時期的文字材料卻相對匱乏。而戰國時代則恰恰又是陶文最為盛行的時期，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戰國文字材料相對匱乏的缺憾。因此，陶文在古文字學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

陶文的發現可以追溯到清道光時期。成書於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的馬星翼撰《鄒縣金石志》中已有關於鄒縣出土陶文的記載。王懿榮的一則題跋中曾談到，道光十四年（一

八三四年）進士、卒於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的吳式芬，收藏過一件傳為長安出土的有銘文的陶鼎。由此可見，陶文的發現當不晚於清道光時期。首次發現齊國陶文的是陳介祺（號簠齋），他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收得「濰之東」出土的「陳悍」陶文，又於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收得秦詔量陶文。從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開始批量收購，至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累計收購陶文達四千餘件，自稱此後「幾已不收矣」。曾自撰對聯：「齊魯陶文四千種，印篆周秦一萬方」，以記其盛。簠齋身後所藏陶文除少量歸周季木等其他收藏家外，分為兩批，其中一批今在青島市博物館，據一九六五年統計，共一千七百九十八件；另一批一千八百餘件，歸前山東省圖書館金石保管所。在陳氏的影響和帶動下，收藏陶文蔚然成風，先後不下六七十家，比較著名的有潘祖蔭、王懿榮、孫文楷與孫文瀾昆仲、方德九、楊昭雋、孫壯、徐世襄、陳子峰、劉鐵雲、羅振玉、（日）太田孝太郎等。王獻唐異軍突起，後來居上，除個人所藏陶文編為《鄒滕古陶文字》刊行外，還為原山東省圖書館金石保管所廣收陶文，累計多達兩萬件。此前公私所藏無出其右者。可惜僅傳搨近千件，餘皆毀於「七七」日軍侵華戰火，據有案可查的共損失陶文一萬五千餘件。周季木收藏陶文不僅數量上與簠齋相埒，而且在品種上超邁前人，既有晚清收藏家所未曾見過的燕國和三晉陶文，又有至今還難以確定國別的陶文。可以說，季木藏陶在陶文發現和收藏史上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

儘管陶文的發現比甲骨文要早六十多年，但陶文的研究與甲骨文和金文相比要遠為滯後。

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到當時印刷條件的局限，晚清以來各家收藏的陶文，祇能依靠傳搨的形式流傳。而搨本數量有限，難以廣為流傳。各家所藏陶文搨本大多作為善本收藏在各大圖書館和文博單位，外界很難利用。清末民國期間印行的《鐵雲藏陶》、《夢庵藏陶》、《季木藏陶》等寥寥數種，至今已是鳳毛麟角，難得一見。高明先生編著的《古陶文彙編》，收錄陶文二千五百種，超過《季木藏陶》一倍，而且有不少是出土地點明確的考古發掘品，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超過了以往。

我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就曾利用田野考古工作之便，先後在鄒縣邾國故城（紀王城）和臨淄齊都故城收集陶文（實物今存山東省考古研究所），還曾從古舊書店買到過簠齋所藏陶文零星搨本。所在單位山東省博物館以收藏陶文宏富見長，收藏未刊和已刊陶文搨本二十餘種近萬件，未經著錄的陶文實物二千件。一九八五年館領導責成我整理館藏陶文。在此基礎上，廣採百家，先後共寓目館內外已刊、未刊陶文圖錄六十餘種，複製、傳搨陶文約二萬餘件，益之以各地考古調查和發掘出土的陶文，總數將近二萬二千件。原曾設想能够在此基礎上編著一部綜合性陶文著作《陶文大系》，包括通論、圖錄、字典、詁林、來源與著錄表等五部分。所恨人生苦短，倏忽間已步入老年，再加上研究興趣廣泛，千頭萬緒，很難把精力全部集中到陶文方面。形勢逼人，如不抓緊，很有可能數十年心血將付之東流。無奈祇好把所得陶文資料剔除重複與破殘，選用一萬二千餘件，編成《陶文圖錄》，與已經竣工的《陶文字

八三四年）進士、卒於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的吳式芬，收藏過一件傳為長安出土的有銘文的陶鼎。由此可見，陶文的發現當不晚於清道光時期。首次發現齊國陶文的是陳介祺（號篋齋），他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收得「濰之東」出土的「陳悍」陶文，又於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收得秦詔量陶文。從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開始批量收購，至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累計收購陶文達四千餘件，自稱此後「幾已不收矣」。曾自撰對聯：「齊魯陶文四千種，印篆周秦一萬方」，以記其盛。篋齋身後所藏陶文除少量歸周季木等其他收藏家外，分為兩批，其中一批今在青島市博物館，據一九六五年統計，共一千七百九十八件；另一批一千八百餘件，歸前山東省圖書館金石保管所。在陳氏的影響和帶動下，收藏陶文蔚然成風，先後不下六七十家，比較著名的有潘祖蔭、王懿榮、孫文楷與孫文瀾昆仲、方德九、楊昭僕、孫壯、徐世襄、陳子峰、劉鐵雲、羅振玉、（日）太田孝太郎等。王獻唐異軍突起，後來居上，除個人所藏陶文編為《鄒滕古陶文字》刊行外，還為原山東省圖書館金石保管所廣收陶文，累計多達兩萬件。此前公私所藏無出其右者。可惜僅傳搨近千件，餘皆毀於「七七」日軍侵華戰火，據有案可查的共損失陶文一萬五千餘件。周季木收藏陶文不僅數量上與篋齋相埒，而且在品種上超邁前人，既有晚清收藏家所未曾見過的燕國和三晉陶文，又有至今還難以確定國別的陶文。可以說，季木藏陶在陶文發現和收藏史上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

儘管陶文的發現比甲骨文要早六十多年，但陶文的研究與甲骨文和金文相比要遠為滯後。

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到當時印刷條件的局限，晚清以來各家收藏的陶文，祇能依靠傳搨的形式流傳。而搨本數量有限，難以廣為流傳。各家所藏陶文搨本大多作為善本收藏在各大圖書館和文博單位，外界很難利用。清末民國期間印行的《鐵雲藏陶》、《夢庵藏陶》、《季木藏陶》等寥寥數種，至今已鳳毛麟角，難得一見。高明先生編著的《古陶文彙編》，收錄陶文二千五百種，超過《季木藏陶》一倍，而且有不少是出土地點明確的考古發掘品，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超過了以往。

我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就曾利用田野考古工作之便，先後在鄒縣邾國故城（紀王城）和臨淄齊都故城收集陶文（實物今存山東省考古研究所），還曾從古舊書店買到過簠齋所藏陶文零星搨本。所在單位山東省博物館以收藏陶文宏富見長，收藏未刊和已刊陶文搨本二十餘種近萬件，未經著錄的陶文實物二千件。一九八五年館領導責成我整理館藏陶文。在此基礎上，廣採百家，先後共寓目館內外已刊、未刊陶文圖錄六十餘種，複製、傳搨陶文約二萬餘件，益之以各地考古調查和發掘出土的陶文，總數將近二萬二千件。原曾設想能够在此基礎上編著一部綜合性陶文著作《陶文大系》，包括通論、圖錄、字典、詁林、來源與著錄表等五部分。所恨人生苦短，倏忽間已步入老年，再加上研究興趣廣泛，千頭萬緒，很難把精力全部集中到陶文方面。形勢逼人，如不抓緊，很有可能數十年心血將付之東流。無奈祇好把所得陶文資料剔除重複與破殘，選用一萬二千餘件，編成《陶文圖錄》，與已經竣工的《陶文字

典》先期出版。其他部分，則祇能俟諸來日了。

《陶文圖錄》按照斷代與分國相結合的體例編排，分爲十卷：第一卷戰國以前，第二至六卷爲戰國與秦代，第七卷爲不明國別，第八卷爲漢代及其以後，第九卷爲參考，第十卷爲僞品及可疑。作爲本書主體的戰國部分，按國別編排，其中第二卷爲齊、第三卷爲鄒（附滕、薛、魯）、第四卷爲燕（附中山）、第五卷爲三晉與兩周（附楚）、第六卷爲秦國與秦代。戰國陶文按國別而不按現在的行政區劃編排，其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第一，現行省的轄區內，在戰國時期往往有多個國家共存，如河北省包括燕、趙、中山，河南省包括三晉（韓、趙、魏）、兩周（東周、西周）以及陳和楚國的一部分，等等。第二，戰國時期每個國家的陶文也不局限於一省一縣。如齊國陶文除臨淄集中出土外，臨淄周圍諸縣如益都、博興、廣饒、惠民也有出土，往東可以遠及膠東半島的黃縣，西可以達鄒平、章邱、濟南，南可以到達魯中南的新泰、滕州，北可以跨省到達天津市。戰國陶文按國別編排可以避免多國陶文相混雜與同一個國家的陶文被割裂的缺點。秦始皇二十六年（前二二一年）統一全國，本書把年代明確的秦代陶文和各省出土的原被定爲戰國的亭市陶文和私名印陶文歸入第六卷的秦代部分。

第一卷中收入的新石器時代特別是大汶口文化陶文，是探討漢字起源時經常被涉及的。這部分陶文是否爲文字，目前分歧還很大。大汶口陶文絕大多數都是燒前刻劃在一種砲彈形

的陶器上，我們曾根據這種陶器具有夾砂、尖底而厚、腹深等形制特點以及出土時器內仍遺留有草木灰的現象，指出這類陶器主要用途是保存火種用的火種罐^①。人類雖然很早就掌握了人工取火技術，但畢竟費工費時，因此對保存火種極為重視。大汶口文化這些刻劃陶文的火種罐上往往在陶文所在部位塗硃，也表明它是與火有關的。莒縣出土這類火種罐的墓葬，都是一些隨葬品較多的大墓，說明這些大墓的墓主應是以保存火種為重要職責之一的氏族的族長。火種罐上的陶文，應是氏族的族徽。其中，日、火、山組成的會意字（《陶文圖錄》一·一·一，以下引用本書時不再注出書名）和該字的簡化（1·2·2），唐蘭讀作「熱」，于省吾釋「旦」。其實，這個從日從火的字應即漢城陽（今莒縣）的炅姓，讀作「桂」^②。《廣韻·去聲·霽》「桂」字條：「後漢《太尉陳球碑》有城陽炅橫，漢末被誅，有四子：一子守墳墓，姓炅；一子避難居徐州，姓香；一子居幽州，姓桂；一子居華陽，姓炅。此四字皆九畫，古惠切。」今炅字族徽陶文出土於莒縣自非偶然，應與漢代城陽炅姓有其淵源關係。看來，炅姓應是經過考古材料證實的最早的姓氏了。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工具。大汶口文化陶文中雖然有象形字，如「戊」（1·2·4）、「斤」（1·2·5），也還有兩三個象形字組成的會意字，如「𠂔」、「炅」等，但還不能記錄語言，從嚴格意義上講，還不能算作文字。祇有出現了形聲字和假借字以後，纔有可能記錄語言，也祇有在這時纔可以說文字已經產生了。本書收錄的一件沂源出土的商代陶文（1·33·1），對

於討論漢字起源有着重要意義。這件陶文刻劃在一件陶鉢的腹部，共有十一個象形字，包括三人、二獸、三樹和一個帶有米字的長方框。長方框的上方還有一個可能用來表示上天的符號。整個畫面好像是燔柴祭天以祈雨的意思。內容雖然大體上可以看懂，但卻無法變成語言讀出來。正因為如此，其他人也還可以對畫面上的內容作出其他的解釋。《說文解字·叙》說：「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許慎不僅對「文」與「字」加以區別，而且還闡明了兩者產生的前後關係。因此，沂源商代陶文儘管象形字多達十一個，但祇能稱之為「文」，還不能稱為文字。

在戰國陶文中，齊國陶文不僅數量多，而且內容異常豐富。根據內容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大類：即官營製陶業、民營製陶業和為數不多的市字類。

齊國官營製陶業產品以量器為主，飲食器很少。作為樂器的陶埙則極為罕見。官營製陶業產品製作工藝精湛，銘文規範典雅。量器陶文格式分繁式和簡式兩種。繁式內容包括地名（或身份）+人名+立事歲+左里畝+毫+量名等六項，個別的還在量名後加「銘」字（2.7.2）。銘文最多者達十四字，量名後另有四字：「𪔐𪔐」為工師名，最後二字疑為「所為」，似屬「工勒其名」的性質（2.13.1）。可以省去其中的一項或某幾項。最簡的格式祇有人名。「立事歲」是齊國特有的紀年格式，類似於楚國的以重大事件紀年。立事即文獻中的蒞事，其原始含義是主持國家的祭祀，後來也泛指主持國家政務的人。如文獻記載中的蒞事者

晉獻公之子奚齊、齊執政大臣慶封之子慶舍、魯卿叔弓。銅器銘文中所見の立事者如春秋齊國執政大臣國佐、公孫竈，戰國時代陳氏宗室陳瑒（舉）等等，都是地位甚高的王公宗室或執政大臣。正因為如此，用他們主持國家祭祀和政務的時間紀年纔有意義。否則，如果立事者的身份是一些「都邑大夫或關尹之類」，那麼這類人不僅身份甚低，而且人數衆多，用他們從政的時間紀年就會毫無意義^③。把「立事歲」の立事者解爲「器物督造者」也是不妥當的。人名前的地名是立事者の居地或封邑，如「内郭」（2.3.1-4）、「堂門」（2.4.1）、「因尚（黨）」（2.4.2）、「平門内」（2.5.1-2）、「華門」（2.10.1-4）等，都是立事者の居地，「平陵」（2.14.1-4）則是陳得的封邑，「王孫」（2.8.1-4）則是陳棱的身份，表明他是齊王的宗室。

「左里畝」是量器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畝通伯」（吳大澂說）、「左里畝」即《管子·輕重戊》の「左右伯」和「左司馬伯公」（李學勤說）。「里」在這裏不是鄉里之里，而應是《管子·小匡》「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中所說的「里」。「毫」字目前還沒有一種合理的解釋。齊國量名有「豆、區、釜、鍾」四級，目前無論是官營還是民營製陶業生產の陶量，乃至銅量，都祇有前三級而不見「鍾」。這是因爲釜十爲鍾，據實測子禾子釜和陳猶釜の容積分別是二萬零四百六十毫升和二萬零五百八十毫升，則鍾の容積應在二十萬毫升以上，約折合小米三四百斤，顯然不便應用。因此，齊國の鍾應與升、斗、石